

大学生主播自媒体创业中的身份认同研究

王婉秋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8日

摘要

自媒体创业以低成本、低门槛、高回报的优势, 成为大学生群体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大学生主播自媒体创业实践为切入点, 基于社会建构理论, 通过对30余位大学生主播的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 探究大学生主播身份认同的困境与生成机制。研究发现, 大学生主播以内容创作为载体开展自我叙事, 与观众互动建构群体归属, 经持续的角色实践巩固身份认同。但可能陷入三重困境, 即算法规训下的数据焦虑与主体性消解、多重角色期待引发的身份模糊与冲突, 以及自我商品化带来的身份异化。

关键词

主播, 自媒体创业, 身份认同

A Study on Identity in Self-Media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 Streamers

Wanqiu Wang

School of Sociolog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ly 12, 2026; accepted: August 11, 2026; published: August 18, 2026

Abstract

With its advantages of low cost, low barriers to entry, and high potential returns, self-media entrepreneurship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athway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achieve self-fulfillment. Taking the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s of college student streamers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and grounded in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this study employ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with over 30 college student streamers to explore the dilemmas and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their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ollege student streamers engage in self-narration

through content creation, construct group belonging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audiences, and consolidate their identity through sustained role performance. However, they may also fall into three interrelated dilemmas: data anxiety and the dissolution of subjectivity under algorithmic discipline, identity ambiguity and conflict arising from multiple role expectations, and identity alienation induced by self-commodification.

Keywords

Streamers, Self-Media Entrepreneurship, Ident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 主播作为一种新兴职业被人们熟知。在传统就业市场岗位收缩的背景下, 因其低成本、低门槛、高回报优势, 许多大学生将其作为创业的首选。社会行动塑造着人们的自我概念, 而角色期待影响着人们的行动。主播作为一种职业身份, 成为大学生制造意义的重要工具, 给他们的自我探索提供机会, 也给他们进行新的身份创造制造机会。但学生与主播角色的重叠, 不同的角色期待对大学生主播提出了多种要求, 在高强度付出时间、精力和情感的情况下, 会出现心理和生理的紧张, 对自身身份认同产生困惑和焦虑。本文将聚焦于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主播创业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建立身份认同的策略方法, 讨论大学生主播如何平衡职业与学业、虚拟与现实, 引导大学生深刻理解平台经济的真实规则与潜在风险, 助其做出更理性的职业规划与创业选择。

2. 文献回顾

在数字社会, 数字技术重构了全球资本运行逻辑, 数据取代了传统生产要素成为新的资本形态[1]。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收集大量免费数据, 通过数字技术有效利用数据, 实现利润攫取与资本增殖[2]。数字资本主义的扩张直接催生了平台经济这一新兴形态。平台作为一个真实或虚拟的空间连结两个或多个客户, 成为他们之间交易的媒介或架桥[3]。在平台中, 用户的注意力被商品化是数字时代价值攫取机制的基础[4]。进入“Web 2.0”时代, 用户从信息接收者转变为生产者, 他们免费为平台补充更多吸引他人注意力的内容[5]。这样的免费劳动隐藏着剥削色彩。卢斌典与孙珮云指出, 数字平台通过集中资源、设置准入壁垒实现平台垄断, 将用户行为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 以记录生活、表达自我等方式模糊生产与消费边界, 掩盖数字劳动本质[6]。林健和克洛埃(Kloet)的研究肯定了平台为社会边缘人士提供创意工作的功能[7]。何威等人也认为短视频创意劳动既带给劳动者收入, 又满足了劳动者选择工作的个人喜好, 其个人生活质量得到保障, 增进了劳动者的福祉与获得感[8]。他们都回避了平台的劳动控制问题, 即数字剥削常以情感愉悦掩盖劳动异化, 使主体自愿成为“数字劳工”。而胡运海则指出创意工作者的劳动如何被异化: 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机制推动了内容生产的标准化, 看似去中心化的创作实践实质服从于中心化的控制[9]。大数据与算法使个体行为从自我表达异化为流量迎合。平台通过实时反馈点赞、浏览量、互动量等后台数据动态规训用户的行为, 形成比物理空间更高效的监控网络, 促使用户学习算法规则, 迎合流量热点。

算法权力不仅重塑行为模式, 更深度解构着主体身份认知。学界普遍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社

会建构过程[10]。库里的“镜中我”理论认为人的自我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互动中产生的,根据感受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认识自己,最终形成自我[11]。数字社会的个体身份建构及困境成为目前学者们普遍关注的议题。如今的个体身份不仅仅包括现实生活里的身份,还包括个体建构于虚拟世界的数字身份。数字身份具有多元性、超域性和可伪性三大特征[12]。聂阳提出“主体性过剩”概念,指出资本过度开发主体潜能,人的欲望受控于算法,个性沦为资本增殖工具[13]。在平台算法规则下,创作者为了作品获得更高的点击量必须牺牲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甚至出现被流量裹挟、唯流量至上的“擦边”行为。此时的个体数字身份进入平台的信息茧房,被打上固定的标签,无可避免地陷入同质化、碎片化困境[14]。并且,当这些行为得到的相应人群追捧,他们的反馈不可避免地重塑着创作者的自我。斯特莱克指出我们拥有迥然不同的自我成分,表现为我们在社会中占据的不同角色位置,我们会根据不同的角色期待做出相应的行为,这是我们的角色认同,它同样构成着自我[15]。令人满意的角色表现既是对社会成员角色地位的认同,也是成员评判自我价值的标准。大学生主播面临着学生、子女与主播角色的重叠,目前社会对多种角色期待的矛盾将影响他们的自我判断,造成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

3. 研究方法

本文以大学生主播为研究对象,依托平台搜索与推荐机制以“大学生直播”“校园主播”等关键词在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检索,并结合平台个性化推荐,选择为全日制在校大学生且以个人身份独立运营直播间停留观看。其直播内容一般以日常生活记录或知识分享为主,具有明确的自我呈现倾向。研究者以普通观众身份进入主播的直播间,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持续性追踪观察,覆盖不同时段及直播主题。观察重点包括主播的语言表达、身体姿态、弹幕互动及其对观众评论的即时回应,同时关注直播结束后的社群讨论。在观察中后期,对主播分别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内容涵盖入行动机、日常直播决策、遭遇的困难、对自身主播身份的认知及未来规划等。结合人工编码和 DeepSeek 对收集到的文字资料进行处理和分析。分析遵循建构主义扎根理论路径: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逐句提取初始概念;继而通过主轴编码将概念归并为更高阶范畴,并探寻其关联;最后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出身份认同这一核心范畴,构建涵盖生成机制与算法困境的解释框架。

4. 大学生主播身份认同建构的困境

(一) 算法下的数据焦虑

在库里看来,个体是通过接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形成自我认知。然而在数字平台时代,他人的评价被量化了。这些量化结果通过实时变化着的在线人数、互动率、停留时长、推流机制等指标呈现出来。主播的身份认同外化为平台的具体数据反映,如果数据不达标,意味着角色失败。戈夫曼的拟剧论视角下,社会互动是一场戏剧表演,个体在前台有意识地运用各种符号道具进行印象管理,以塑造特定角色形象,维系观众的“情境定义”[16]。而在直播这一数字化的互动情境中,平台算法扮演了“剧场经理”的角色。它不仅设定舞台规则,还通过数据指标实时评价表演成效,甚至决定表演者能否获得观众。当主播在镜头前进行自我呈现时,其表演质量不再仅由现场观众的即时反馈决定,数据也成为衡量角色扮演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尺。

“这平台特别严格,他会考核你的一些互动率、点赞、关注,考核你直播间的人停留时长,还考核你的进房率。我刚开播第二天,我想做一下数据。数据要是不好的话,他不推人的。”更关键的是,这种考核并非静态标准,而是逐层升级的阶梯。当你挂上商品链接后,考核数据从单一的互动率升级为针对互动与带货转化率的考核。

大学生主播在面对这套算法机制时陷入了双重困境。第一重困境由可见性焦虑构成,即他们渴望被

推送到更多人面前,但实际数据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这种落差引发的焦虑。当数据表现不佳时,平台便停止推流,主播的身份就无法被观众“看见”。然而,“被看见”恰恰是主播身份得以存在的根本前提。前台失去了观众,所有精心设计的台词与表情便沦为无效的独白,角色身份也随之悬置。“感觉这个事情好难,直播间一直个位数,就是很影响人的心态……每天个位数在线,我都要崩溃了。而且直播间没有人跟你讲话,每天就在自言自语,重复话术。”维护数据不仅需要持续学习平台算法,还需要克服数据不理想造成的心理焦虑。这种对身心持续的消耗不仅影响自我评价,甚至催生出对自身能力的根本怀疑。

第二重困境源于自我期望与平台标签之间的错位。大学生主播往往缺乏实践经验,仅根据其他博主的简单描述盲目开播,然而进入直播间的观众却与自己设想的目标人群大相径庭。“我昨天化妆了,吸引很多男生进来……还影响我这个标签了,我就决定今天不化妆了……因为后期我如果想卖货的话,到时候还是推给很多男生,他们也不买东西。”博主通过化妆来展示美妆专业度,以此完成身份实践,她们根据预设角色选择服装、设计话术、安排互动方式,以维持前后一致的表演风格。但由于平台标签机制进行了粗暴分类,算法将她推送至了泛娱乐化的流量池。这让她感到一种身份被误读的焦虑,原本预设好的角色规范反而成了干扰数字身份定位的因素。由此,主播不仅需要应对数据指标的波动,还需要在不稳定的流量结构中持续捍卫自己对“我是谁”“我应面向谁表演”的定义权。

(二) 多重身份的模糊与冲突

社会建构论认为,身份并非固定本质,而是在社会互动中被不断建构和协商的产物[17]。对于大学生主播而言,这种建构性尤其显著。他们至少同时面对三组身份期待,分别来自学校、家庭和平台这三个场域。来自学校场域的学生身份、来自家庭场域的子女身份以及来自平台场域的主播身份共存于一身。当这些期待之间出现张力时,身份认同便会因此遭遇裂隙。

平台会通过识别关键词对相关图文、视频、直播间提供专门的流量扶持。为了得到曝光度,主播们常常会准备一段“上人话术”,在直播间观众减少时重复念诵以达到平台推流目的。“宝贝们希望大家理解我一下,因为我直播间如果再没有流量的话,真挣不到米……我前半场说的那些话是为了流量,不是人机的,但是我能保证都是真的事情,很真实。”这表示主播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面对不同的观众期待时选择展演不同的自我。她向直播间观众塑造的勤工俭学形象并非单纯的自我表达,而是被平台流量逻辑形塑的一种身份策略。

与此同时,这种表达造成了主播身份与日常生活中的“我”之间的区隔焦虑。“不希望校友同班同学刷到我的直播间,因为我每天在直播间讲家里的事情,我怕大家一提到我就是直播间那个说家里情况不好的那女的。”她在直播间展演的勤工俭学形象在平台语境中是她的流量资产,可在校园日常语境中却可能沦为单一化的标签,使她丧失被全面看待的机会。这种焦虑说明,大学生主播的身份建构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始终需要面对不同社会场域之间的身份边界管理问题。

大学生主播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而这些角色所附带的期待在现实中往往互相冲突。首先是经济角色的倒置。通常情况下,大学生日常生活是依赖于家庭经济的,而主播收入可能使其转变为家庭的经济贡献者甚至“顶梁柱”,能获得更高的家庭地位。但这一新获得的角色并不稳固,完全依赖于不稳定的直播间人数,反而给大学生带来了更大的数据焦虑。其次是主播角色与其他角色的时间与精力冲突。受访者每天面对镜头保持高强度互动,还要兼顾学业和另外两份工作。虽然她没有直接抱怨疲惫,但当她委婉拒绝每天直播两次时,已然透露出多重角色对她造成的压力。作为学生,她的本职任务与主播的运营需求在时间上高度重叠。而作为子女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又在经济上给她施加了额外的压力。这种多线程的角色承担导致她的身份认同始终处于一种动态之中。任何一个角色的懈怠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因此她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去明确自我定位。

(三) 自我商品化与异化

从数字资本主义的视角来看,大学生主播在平台上不仅是在表达自我,更是在将自我转化为可供变现的内容商品。这一过程在带来经济收益可能性的同时,也引发了深层的身份异化。

平台以小时为单位评判直播间的互动率、停留时长和进房率。通过这种方式,平台将每一次直播都切割成了可量化的时间片段,也将主播的劳动价值简化成了一组组数字。身份不再是“我如何定义自己”,而是“数据如何定义我”。数据考核体现了平台算法规则对主播们身份建构的控制。数据考核往往意味着标准的存在,意味着有一个高于个体的评判者在持续裁决每一次直播的成败,而这个评判者不会因为主播的勤奋或真诚就放宽标准。反过来说,主播们之所以用“做数据”“打标签”“养号”等概念来描述自己的日常工作,是因为他们的日常实践就是平台中心主义为主,以迎合算法逻辑进行直播。这种真实性也体现在主播们对数据表现的持续监测与主动干预上。主播群体作为被评估的一方,扮演着被动的角色。他们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持续被观察、被打分、被分类的系统之中。因而对这套系统的规则保持着高度警觉,他们会在直播中时刻提醒并约束着自己的行为,避免提及违禁词。同时,他们也将时刻追逐流量热点,将自身包装为更受欢迎的“商品”。他们或选择讲述家庭困境以吸引流量,将被商品化的情感叙事作为流量工具;或选择将私人生活场景毫无保留地暴露于镜头之下,使日常本身成为可被消费的内容;或选择将书桌、笔记与时钟搬进直播间,以“沉浸式陪伴”之名将自律本身商品化……

无论是身体、情感、日常还是苦难,一旦进入平台的内容生产链条,平台就会剥离它们原有的私人属性,并将它们转化为可供分类、推送和变现的数据商品。主播们主动或被动地将自我的碎片交付给算法,而算法回馈给他们的则是一套持续更新的数据。在这一过程中,被商品化的不仅是主播的内容生产劳动,更是他们理解自我的方式本身。

5. 大学生主播身份认同的生成机制

尽管平台算法构成了结构性约束,大学生主播并非被动接受者。

他们通过自觉的“打标签”实践,主动参与自身身份的建构与校准。大学生主播们将打标签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开播前的“养号”,即持续刷同赛道内容,直到平台推荐页完全被用来定位自己的相关内容占据;第二层是直播间的语音标签,即在口播中反复告知观众自己的赛道定位;第三层是作品发布时的文字标签,即在视频文案中明确标注关键词。这说明他们不仅理解了平台的标签逻辑,还有意识地塑造着自己的数字身份。从自我叙事的视角来看,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主播以内容创作为载体,不断向平台与观众讲述“我是谁”“我代表什么”的过程。每一层标签都是自我叙事的一个构件,通过反复的内容输出与定位声明,主播逐渐勾勒出清晰的数字身份轮廓。与之类似的还有针对无效观众采取的选择性忽视策略:当直播间出现大量无效观众时,不能产生大量互动。“搭理多了之后,平台就以为你这个账号想要多进一点类似的人”。主播意识到互动行为本身就是数据信号,与谁互动、如何互动都会被算法纳入下一轮推流的决策依据。因此,不搭理是一种有意识的边界划定行为。通过拒绝与某些类型观众建立互动关系,来向平台传递“这不是我的目标人群”的信号。

主动学习和打磨话术是大学生主播的另一项重要实践。熟悉话术流程本质上是熟悉一个完整的商业角色表演脚本,大学生通过将主播角色内化为一套可复制行为模式的方式来完成身份转变。而当他们能够流利地念出话术并获得观众正向反馈时,“主播”身份便从模仿走向内化。角色知识在社会互动中被生产、传播和内化,个体通过反复操练将外部的角色规范转化为内部的自我认知。

同时,主播还通过实时弹幕、评论、粉丝私信等渠道持续接收着具体且多声部的反馈。他们依据这些反馈来调整自己的言行策略和身份定位。主播将观众的即时反应作为核心指标,用来验证自己身份表

达的有效性。能留住人的话术就继续沿用，留不住人的话术则及时更换。本质上是主播在通过观众反馈来不断微调自己的“人设”。不仅如此，这种持续的双向互动也在悄然建构着主播与观众之间的群体归属。稳定的观众群体会形成特定的互动风格与话语体系，即粉丝通过重复的问候语、专属昵称和共同的内部梗，与主播建立起一种超越交易关系的身份联结。主播感受到被关注、被认可、被需要，这种归属感反过来又强化了其对“主播”这一身份的认同与投入。当面对毫无根据的猜测时，主播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和辩护冲动。他们试图通过强调细节提高真实性的方式，来修复已被质疑的身份。这种辩护行为说明主播并非无差别接受观众的看法，而是会筛选、回应、反驳那些与自我认知严重冲突的内容。换言之，主播的身份认同是一个持续协商的对话过程。

6. 结语

大学生主播的身份认同困境并非单纯由个体心理调适问题导致，算法权力和平台经济逻辑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本研究表明，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运行框架下，平台通过数据采集与算法推荐将用户的注意力、情感表达乃至日常互动悉数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而大学生主播在这一过程中既是内容的生产者，亦是平台无偿征用的“数字劳工”。在数据考核的持续规训下，“被看见”的渴望转化为对流量指标的深度依赖，数字身份也慢慢变成算法的一种反映。主播们表面上在表达自己，实际上却在经历身份的异化。

与此同时，多重社会角色间的张力构成了另一重压力来源。大学生主播同时面对学生、子女与主播三重角色的期待，这些期待之间并非协调一致，而是时常相互冲突。身份认同在不同场域间来回摇摆，精神上的压力与痛苦随之而生。

然而，本研究发现大学生主播并不只是被动接受。他们会主动打标签，选择性地忽略一些观众，也会花心思打磨话术，根据反馈调整做法。这些实践让他们在算法框架里争取到了一些主动权。即便在高度中心化的平台体系中，个体行动者仍能通过策略性实践参与自身身份的再造。

大学生主播的身份认同困境，本质上是数字时代青年群体在平台经济中寻求自我实现所付出的代价。这提醒我们，高校就业指导与媒介素养教育亟需超越传统的职业规划范式，帮助学生看破流量神话的表象，理解平台经济真实的规则与潜在的风险。唯有在充分认知结构性约束的基础上，大学生才能在职业选择中保有清醒的自我意识，避免将全部自我交付给随时可能变更的算法，真正实现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平衡与自洽。

参考文献

- [1] [奥]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德]托马斯·拉姆什. 数据资本时代[M]. 李晓霞，周涛，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 [2] [日]森健，日户浩之. 数字资本主义[M]. 野村综研(大连)科技有限公司，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 [3] 徐晋，张祥建. 平台经济学初探[J]. 中国工业经济，2006(5): 40-47.
- [4] Svec, H.A. (2015) On Dallas Smythe's "Audience Commodity": An Interview with Lee McGuigan and Vincent Manzerolle.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3, 270-273. <https://doi.org/10.31269/triplec.v13i2.691>
- [5] Resurreccion, A.D. (2015) Dependence of Digital Economy on Free Lab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5, 461-465. <https://doi.org/10.7763/ijssh.2015.v5.500>
- [6] 卢斌典，孙珮云. 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逻辑及其批判[J]. 社会主义研究，2023(5): 48-54.
- [7] Lin, J. and de Kloet, J. (2019) Platformization of the Unlikely Creative Class: Kuaishou and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 *Social Media + Society*, 5, 1-12.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19883430>
- [8] 何威，曹书乐，丁妮，等. 工作、福祉与获得感：短视频平台上的创意劳动者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 27(6): 39-57+126-127.
- [9] 胡运海.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何以可能？——基于瘾欲、剥削和加速三重视域[J]. 理论界，2022(7): 44-51.

-
- [10] <https://www.cqvip.com/doc/journal/00002G8NKJ707JP0MNDO7JP16DR?sign=0d9c7efed0282ff85c17b4f48b593a3c12a0f38268b701ee80f06ea94c089b9&expireTime=1800407905529&resourceId=00002G8NKJ707JP0MNDO7JP16DR&type=1>
- [11] [美]库利.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118.
- [12] 张楠迪扬, 朱弋天. 数字身份: 形态类型、管理逻辑与发展趋势[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5(2): 46-58.
- [13] 聂阳.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体性过剩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2, 43(3): 74-80.
- [14] 魏郡. 数字全景敞视下青年身份的建构与复归[J]. 新疆社会科学, 2025(4): 162-173.
- [15] Stryker, S. (1980)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 Social Structural Version. Benjamin Cummings.
- [16] [美]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7] 伯格, 卢克曼. 现实的社会建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